

张越 著

中国清代思想史

人民出版社

本卷提要

本卷所叙的思想史内容,包括从清朝立国至清朝灭亡的整个清朝一代的思想史发展过程。

清代思想史,分清初、乾嘉时期、道咸以至清末三大部分。

清初著名思想家大都参加过抗清复明的武装斗争。坎坷的经历和时代的剧变,对他们的思想观点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造成相当的影响。清初思想博大精深,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学术大师们总结了前代思想,开启了清代学术门径,形成了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次百家百鸣的灿烂时代。

乾嘉时期盛行朴实考据之学风,训诂考证、复归汉学导致了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的一次空前的整理和总结。乾嘉考据学是清代最主要的学术流派,其总体成就应当得到肯定。

道咸以至清末,以今文经学的复兴开其端,思想家们以阐发“微言大义”、倡言改革变法为宗旨。随着古代历史的结束,清末思想界在西学的影响下,着意寻求救国图强的思想方案,近代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清王朝最终走向灭亡。

目 录

中国清代思想史

一、清代思想概述	1
二、清初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和观点	6
(一) 黄宗羲:杰出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史撰述	6
1. 黄宗羲的生平、著作	6
2.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	8
3. 《明夷待访录》的社会政治思想	10
4. 《明儒学案》: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史撰述	16
(二) 顾炎武:务实学风的倡导者和经世思想	20
1. 顾炎武的生平	20
2. 宏富的学术成就和笃实致用的治学风格	22
3. 对理学的批判:“经学即理学”	27
4. 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	30
(三) 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	33
1. 王夫之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33
2. 王夫之的哲学本体论	37
3. 王夫之的哲学认识论	41
4. 势、理合一的历史观及史论	45
(四) 颜李学派及清初其他思想家	49
1. 方以智的博学与哲学思想	49
2. 颜李学派的实学思想	54
3. 清初其他思想家	59

(五)清初史学略述	68
1. 清初的官修和私修史书	68
2. 顾祖禹、万斯同、全祖望的史学成就	70
三、乾、嘉时期的学术和思想	75
(一)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成就	75
1. 乾嘉考据学的形成	75
2. 乾嘉学派在经学和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成就	80
(二)戴震的学术及其哲学思想	85
1. 生平及学术	85
2. 戴震的哲学观点	89
3. “血气心知”的认识论	91
4. 对理学的批判	93
(三)汪中、洪亮吉的学术和思想	96
1. 汪中的学术思想	96
2. 洪亮吉的无神论思想	102
(四)焦循、阮元的学术和思想	108
1. 焦循广博的学识及思想观点	108
2. 阮元对乾嘉学术的总结	117
(五)乾嘉时期的史学	127
1. 乾嘉时期史学的总体成就	127
2. 王鸣盛的史考与史论	134
3. 钱大昕的博学及学术成就	139
4. 赵翼的史论	147
5. 崔述的疑古史学	152
(六)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158
1. 生平及其哲学思想	158
2. 对古代史学理论的阐述和总结	163

四、道、咸以至清末的社会思潮	173
(一) 今文经学的复兴与龚自珍、魏源的经学思想	173
1. 今文经学的复兴	173
2. 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和学术观点	175
3. 魏源的思想及《海国图志》的影响	182
(二) 晚清兴起的洋务思潮	187
(三) 戊戌变法维新思潮	191
1. 近代早期的维新思潮	191
2. 戊戌变法维新思潮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196
3. 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思想和哲学观点	200
4. 严复的《天演论》和谭嗣同的《仁学》	205
(四) 清末的民主革命思潮和其他社会思潮	209
1.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哲学观点	209
2. 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213
(五) 史学近代化的开端	219
1. 史学风气的转变	219
2. 新史学思潮与近代史学的产生	224
五、结 语	228

一、清代思想概述

清朝的思想发展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清初、乾嘉时期、道咸以至清末。与清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密切联系,清代思想主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内容,从意识形态领域反映了清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

思想与思潮的演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会如政权更迭那样,有明确的时间标志。清代的思想和学术发展,上承晚明学术开启的路径,通过众多思想家的杰出成就而显示出博大恢弘的气象。乾嘉学派片面因袭了清初务实致用的学风,在政治压力的缝隙之中,努力填补了因理学的没落而造成的学术思想领域的真空,他们用自己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推出了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个学术流派——清代汉学。晚清学术思想以今文经学的复兴为开端,对“微言大义”的新解成为变法图强的理论依据,而挽救民族危机的紧迫感和西学的涌入,使清末的各种社会思潮成为近代早期思想史的主旋律。

需要说明的是,要全面完整的了解清代思想史,还需从上追溯到明末清初以至晚明、向下沿续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的思想发展脉络。特别是晚清与近代史早期在时间上有半个多世纪的重合期,对这一时期思想史的叙述断以清朝灭亡的 1911 年,显得很仓猝、不完整,这一点是应当注意的。

经世思潮作为挽救社会危机的思想潮流，初兴于晚明。以徐光启和复社中的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激烈批判了空疏学风，提倡实学，讲求学以致用。受经世致用思潮的直接影响，出现了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具体实用的专门著作，也出现了焦竑、陈第等究心于实学的学问家。此外，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也对久为封闭的中国产生了影响。经世之学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促使思想界出现了尖锐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的言论，同时也酝酿着一种以独立思考为特征、以离经叛道为内容的崭新的思想倾向。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明朝灭亡的惨痛结局，使得明末清初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把亡国的原因归结为明末统治的腐败和宋明理学空言心性误国等方面。以宣传反清复明言论开其端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在清朝统治渐趋稳定之后，依旧把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和批判宋明理学作为他们思想观点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亡国之痛使他们在反思明朝何以灭亡的基础上，继承了晚明思潮的主要部分。当然，明末曾经酝酿的那种新的思想萌芽没有也不可能在新的统治秩序下继续发展了。

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概括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他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①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翻然几变，内容十分丰富也比较复杂，但是特征也很突出。很显然，这与不同的时代特征有着深刻的联系，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虽然这里并没有能用更多的篇幅去详细地叙述。王国维所言，基本说出了清朝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的总体特征。

清初思想以博大见长。清初思想家多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

^①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23。

验和深厚的文化素养,他们总结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在批判继承前人留下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古代哲学的最高点。王夫之的哲学思想、黄宗羲的社会政治思想、顾炎武的博通贯、方以智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质测”之学、颜李学派的“实学、实习、实用”之学、傅山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万斯同的明史研究、顾祖禹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等等,均显示出了清初学术思想的博大气势。其中所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与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形成鲜明对照。清初诸大家,一般都对理学进行了坚决批判。王夫之指出朱熹学说与“圣人之言异”,顾炎武强调“经学即理学”,颜元则进一步揭露说:“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否定了理学的正统地位。对宋明理学的批判,造成了对经学的回归。清初学者不约而同地用经学取代理学的位置。这种现象,在乾嘉时期表现为汉学的复兴,在道咸时期表现为今文经学的复兴。顾炎武所说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研究途径,在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人的共同实践中,为乾嘉学派所接受。

顾炎武学贯经史百家,典章名物、天文地理、河漕兵书、音韵训诂无所不通。乾嘉学派直接继承了顾炎武的治学方法,这一点毋庸置疑。顾炎武学术的“治道”精神却没能进一步得到发扬,这一点其实也就是乾嘉时期与清初在学术思想上的不同之处。乾嘉考据方法,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只是文字训诂方法。乾嘉考据重怀疑、重证据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在方法论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高峰。朴学学风是对于宋明以来“束书不观、游谈无垠”空疏学风在实际行动上的否定,反理学的性质不言自明,深研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的汉学大师戴震,以揭出理

学“以理杀人”而基本上终结了理学。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组合而成的:康乾盛世造成的安定局面、政治压力使人不能涉及现实等应视为外因和近因;用经学取代已趋瓦解的理学的统治地位,对两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总结性的大规模研究和整理的时机的成熟等应视为内因和远因。乾嘉时代涌现出了一批一流的以考据见长的大学者,如惠栋、戴震、段玉裁、程瑶田、王念孙、王引之、孙诒让、孙星衍、王鸣盛、钱大昕、焦循、阮元,等等,在学界如群星璀璨、交相辉映。他们以系统娴熟的考据学为标志,形成了中国古代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个主要学术流派,清代汉学遂显扬于世。正如钱大昕所言:“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作为乾嘉考据的重要内容之一,乾嘉史学也成就斐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被誉为乾嘉史学三大大家。章学诚从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提炼出了“六经皆史”、“经世致用”、“史德”、“史意”等一系列有见识的史学思想来加以阐述,在乾嘉史学中独树一帜。崔述的疑古史学对近现代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乾嘉学派以其精确严密的考据方法,完成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整理,为保存、研读、理解、使用古代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道咸以后,汉学考据因其盲目尊信汉儒经说,并且在方法上也失于繁琐,从而逐渐衰微。同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明显没落,社会危机严重。以龚自珍为代表,进步思想家开始批判专制统治,主张改革变法,倡言今文经学,主张学术应经世致用,抨击汉学和宋学。晚清学术思想在治今文经学与经世思潮的合流中,开始表现为新的内容和特征。鸦片战争以后,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的危机感,造成今文经学在思想领域的复兴。讲解微言大义以干预时政,发挥“公羊三世说”以提倡变法改制,又讲求兵农河

漕、边防海防等实用之学,成为当时流行的进步思潮。为了救国图强,魏源等人还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久已封闭的国门不得不对外打开,西学的涌入,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倡言新学提供了条件。中国思想史步入了近代化的历程。学习西方、变法图强运动随之高涨。清末,受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主张兴民权,传播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强烈抨击君主专制政体和传统的纲常伦理道德,成为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内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的理论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要求。国粹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等社会思潮也同时兴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外国侵略、实现国家振兴这一总体目标,近代学术文化思想向着更高层次和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发展,而清王朝则走向灭亡。

二、清初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和观点

清初顺、康两朝,涌现出一批思想家。他们生活于明清更迭的历史大动荡时期,时代的变迁促使他们在哲学领域的广阔空间里探索、思辨、沉思和著述。清初思想界以其敏感而活跃的气氛和丰富而突出的成就,被比之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个绚丽的时代。这是由清初众多杰出的思想家们共同绘制的一幅博大精深、影响久远的思想史画卷。他们各守其学、各具特色、各有所长,本章即以思想家本人为主,分别介绍他们的思想、观点和学术成就。

(一)黄宗羲:杰出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史撰述

1. 黄宗羲的生平、著作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称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黄宗羲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这是一个“天崩地解”^①的时代,他一生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而跌宕

^① 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

起伏、历经坎坷。晚年，他自题画像时，对自己的经历这样概括道：“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① 这也就是黄宗羲生平的大致轮廓。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人，熹宗天启年间，因疏劾魏忠贤和客氏，死于诏狱。黄宗羲少时随父在任，耳闻目睹东林党人的斗争经过，受到很大的影响，加之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乘毅宗朱由检镇压阉党之机，袖铁锥入京伸冤，亲手击杀魏忠贤的两名爪牙。时年19岁的黄宗羲所表现出的血性和胆魄，使他成为东林子弟中的领袖人物。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阉宦卷土重来，黄宗羲与复社名士140余人联名所作的《留都防乱公揭》，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南明小朝廷建立后，马、阮对东林、复社进行了残酷镇压，黄宗羲在清军南下逼近南京的混乱状态下，侥幸脱身，亡命日本。这就是黄宗羲所谓“初锢之为党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黄宗羲没有写出有价值的著作，他的主要精力用于与权阉的政治斗争方面，但是他所经历和体验到的一切，为以后的著述提供了条件。

“继指之为游侠”，指的是黄宗羲参加抗清活动的近10年时间的经历。他与两个弟弟“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营’。”^② 失败后，遁入四明山寨，逃避清兵追捕。后又随明鲁王政权从事匡复活动，一度飘泊海上，每天与吴钟峦等人正襟讲学。面对茫茫海天，联想起国破家亡的处境，黄宗羲在《思旧录》中写道：“觞余于鲸背之上，落日狂涛，凄然相对，但觉从古兴亡，交集此时，何处容腐儒道得一句。”顺治

① 黄炳堃：《黄梨洲先生年谱》卷首《自题画像》。

②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十年(1653年),鲁王去监国号,眼看大局已定,复国无望,他开始转而专事著述讲学。在这一阶段,黄宗羲在动荡的环境中没有条件从事著述,著作仍然不多。然而亡国的惨痛结局,对于他的思想影响至深。

黄宗羲携老母回到乡里,集中精力开始了他后半生的著述生涯。他幼年读书即不守章句,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完了二十一史。青年时为父伸冤,归浙后师从刘宗周,成为其门下著名弟子。康熙六年(1667年),他重开由他老师刘宗周创办的已中断了20余年的“证人书院”。黄宗羲的讲学造成了很大影响,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学风所至,形成了著名的浙东学派。他用了近10年的时间,完成了《明夷待访录》一书的著述。

黄宗羲的后半生勤奋著述,他撰写和编纂了近二千万字的著作。除《明夷待访录》外,重要的还有《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以及第一部学案体的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黄宗羲生前未完成全书,后由全祖望和黄百家完成)。编定了《明文案》、《明文海》、《明文授读》。还数次整理自己的著作,勘定《南雷文案》,又删成《南雷文定》、《南雷文约》。

2.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显得晦暗生涩,或者说,他并未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因此,我们只能就黄宗羲的哲学思想倾向作一初步和粗线条的叙述。

黄宗羲晚年潜心于史学、理学和经学的研究。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对于理学的反省和批判方面。特点是从经世的立场出发,否定明末以来学术思想上流行的空疏学风。

黄宗羲对理学的空疏学风感到痛心疾首。他说：

、尝谓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为径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之苑为词章，惜儒森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愈巧乎？^①

这里的“逃之者愈巧”，指的是理学和心学都不能解决现实生活问题，都与“天崩地解”的社会实际脱节。

他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们以《四书集注》和《性理大全》作为衡量古今学术和臧否人物的唯一标准的作法。他认为即使自己的见解与经传不符，亦无关宏旨，不要为世俗所屈。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在自然观上继承其师刘宗周的“理依于气”的观点。认为气的运动变化形成四季循环和万物兴衰，气是宇宙存在的根本形态。如“盈天地皆气也”^②，“天地之间只有一气”，^③“天以气化流行而生人、物，纯是一团和气”。^④ 这些说法承袭于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等人，很多处在文字上也基本一致。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黄宗羲坚持以气为本、理是气的理的观点。明初学者薛瑄曾借日光与飞鸟为例，把理比作日光，把气比作飞鸟，认为：飞鸟载日光而飞行，故理气无先后可言，但日光并

① 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

② 《明儒学案·戴山学案》。

③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

④ 《孟子师说·人之所以异章》。

不与鸟同往俱灭，故气有聚散，理无聚散。薛瑄的观点在表面上认为理气统一无先后，实质上是说理为永恒、为主导；气则处于服从地位。黄宗羲则认为：“盖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气无穷尽，理无究尽。不特理无聚散，气亦无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气为方来之气，亦不以已往之理为方来之理。不特气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① 不仅指出鸟与日光不俱有、不俱无、“不可为喻”的逻辑错误，还从本质上指出气与理同样处于守恒状态，不存在谁有聚散的问题；然而从具体事物来看，则是理气都处于日新不已的变动状态，同样不存在无聚散的问题。

黄宗羲还批判了曹端分析朱熹人马之喻而指出的“理叹气”说。指出，理与气作为概念，不能与客观实在相混淆，“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②

3. 明夷待访录 的社会政治思想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从事著述生活阶段的前期著作。此时的黄宗羲目睹了明朝的种种腐败现象和黑暗统治，又刚刚从抗清复明的斗争活动中返回乡里隐居著述，时事的剧变和无望的抗争已经使他认清了大局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对此进行一番深刻的思考。“明夷”二字源于《周易》卦名，卦辞是“利艰贞”，《彖传》释为“晦其明也，内难而正其志，箕子以之”，意思是贤人处于艰难之境而志气不衰。黄宗羲如同一个刚刚从火线上下来的人一样，失败后的愤懑心态促使他要将自己

① 《明儒学案·河东学案》。

②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

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付之于书,以待后之来访者。

全书由 21 篇单篇论文汇集而成。在编排上可以看出是以若干专题为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论述内容包括中央政制、地方机制、教育、田制、兵制、财经、阉宦等,对于持续几千年的中国专制政体的方方面面作了剖析和批判。

《原君》、《原臣》、《原法》、《置相》4 篇,组成了《明夷待访录》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中央政制、封建议政等问题。这也是黄宗羲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

“天下为主,君为客”,是这部分内容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有别于儒家的“民贵君轻”的说法。他把朝代与天下区别开来,认为朝代兴亡与天下治乱并无关系,既然是“天下为主、君为客”,那么,“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①在这里,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大胆的疑问,这在传统的正宗儒家思想中是破天荒的。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自不得自私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②

黄宗羲反对君臣关系就是“君为臣纲”的关系,他认定臣不是君之臣,不能“私其一人一姓”,“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③ 黄宗羲理想中的“君臣”关系,应该是共同负担人民公共“利害”的分工关系。“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④ 因此,天下大事,天

① 《原臣》。

② 《原君》。

③ 《原臣》。

④ 《置相》。

子、大臣共同议定。指出在同样致力于天下万民忧乐的前提下，君臣二者“名异而实同”。这里透出一点君臣平等的意思。

黄宗羲探索了维护皇权的专制社会中的法律问题。他认为实行中的法制是“非法之法”，其特点是“藏天下于筐篋”，“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①清楚地揭示出其虚伪的实质，也得出“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的结论。那么好的法制应该是什么？黄宗羲谓之“无法之法”，具体的内容由于缺乏历史实践，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是“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学校》、《取士上》、《取士下》3篇，组成了《明夷待访录》的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文化教育、擢拔人才、取士制度等问题。学校取士制度与作官为臣是直接相联的，搞好这一环节，就可以实现黄宗羲所希望的君臣关系和起到限制君主权力的作用，因此与上个部分有着内在联系。

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是为养士而设的教育机关，更重要的是要起到议政的政治作用。他说：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②

① 《原法》。

② 《学校》。